


创 伤记忆



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

张志扬 ■ 著

Chuang
shang
Jiyi



上海三联书店

创伤记忆

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

张志扬 著

**Chuang
shang
Jiyi**

上海三联书店

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

著 者/张志扬

责任编辑/倪为国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顾崖清

出 版/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三联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49 千字

印 张/10.75

印 数/1—5000

ISBN7 - 5426 - 1268 - 9
B·106 定价 1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张志扬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ISBN 7 - 5426 - 1268 - 9

I . 创… II . 张… III . 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482 号

目 录

引 论	1
创伤记忆	31
一、现象学问题	33
二、“创伤记忆”的现象学分析	37
1. 为什么选取“创伤记忆”	37
2. 什么是“创伤记忆”	38
a. “苦难记忆”与“创伤记忆”	40
b. “传统性”——“情结记忆”的定式	43
c. “创伤记忆Ⅰ”——以“国家”观念为体	50
d. “意识形态性”——“情结记忆”的变式	52
e. “创伤记忆Ⅱ”——以“个人”生存为体	61
3. 如何分析“创伤记忆”	69
a. “创伤记忆”在意识中的定位与越界	70
b. “感知”的给予性与“反思”的还原性	72
c. “记忆”的认同与“想象”的置换	76

三、结语：中国现代哲学的维度	81
个案分析	83
一、巴金的“真话纪念碑”	85
引子	85
陈述	89
控诉“四人帮”和“文革派”	89
批评“长官意志”	100
反省“意识形态”	105
破除“领袖崇拜”	115
分析	116
为何在反省中画圆？	116
“心里话”的“心”在“迷魂汤”中呢！	125
“迷魂汤”与“理想罪”	133
“解释自己”与“改变自己”	140
二、曾卓的“信仰、寂寞与爱”	143
我是谁？	144
诗的见证	146
信仰的界限	153
孤独的指向	159
爱在生死迷茫处	163
三、汉语现代学重审与重建的两难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反省 意向性分析	169
概述	173
“前言”	173

“一、现代学的问题意识”	177
“二、现代性问题的累积”	184
“三、个体言说与‘主义’话语”	188
“四、审美主义与现代性”	194
“五、怨恨与现代性”	197
“六、宗教与民主社会的自由建构”	201
分述	202
1.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假问题吗?	203
2. “中国审美主义的独特性与优位性”是真问题吗?	209
3. 怨恨动机与社会主义精神	215
评论	224
1. 理念:“神义论”到“人义论”,是对还是错?	228
a. 历史“下行”吗?	228
b. 超世的“隐喻”	231
c. 宗教的“有形”与“无形”	233
d. 舍勒的“怨恨”	236
e. 福柯的“身体性”	239
2. 方法:现象学的“先天性相关”	245
四、问题与思路	
——一种“注意链”的现象描述	251
问题:“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	251
思路:	253
1. 引子	253
2. 问题的提出	258
3. 动机中的不稳定性	263
4. 动机结构中的“注意链”	266
5. 注意链的中项 I 语言空间的三个层次或“语言的	

4 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

“两不性”	267
6. 注意链的中项Ⅱ “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或 “创伤记忆”	273
7. 注意链的中项Ⅲ 现象学的四重置换或“超验的 中立性”	279
8. 信仰与感觉之间的意义危机或“个人自律性”的语言 教化	295
9. 结语	307
五、记忆与记载	309
1. 访谈录一则	309
2. 表现与揭示或作为事件与文献之中介的记忆的 文字化及其权限	317
跋	337

引 论

—

《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写于1995年底。它原是作为《现代哲学的维度》一书的“导言”。1996年4月，我带它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后，认同者甚微。现象学仍然在胡塞尔那里。我没有能力像法国人请现象学那样也把现象学请到中国来。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先生另有一番看法。他希望我将此“导言”拉出单独成书，不要太长，八万字即可，尽快给他。

“单独成书”的建议很有吸引力，但我没有按林先生的要求做。

对于我，“创伤记忆”，不仅是《现代哲学的维度》的“导言”，也是“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这个难题的出口。两者有不同的取向。

作为“导言”，“创伤记忆”旨在否定形而上学的古典形态

——“本体论同一”及其意识形态化后的“伪科学性”与“权力性”，由此完成现代转型以开拓现代哲学的新维度。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性缺失，此新维度主要设定在：a. 语言的界面性；b. 超验的中立性；c. 个人的自律性。

作为“出口”，“创伤记忆”更专注于个人意识的创伤化所形成的“情结”是否障碍意向力的原始发生。它能推动“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朝可解的腹地深入，即记忆的关联域怎样敞开才能进入新生代而免遭重复的困扼。

前一取向，我面对的是哲学或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需要现代学作为背景。

后一取向，我只面对一个一个的个人，仅作创伤记忆的案例分析，假若我不打算作纯粹意识学的重审与重建的话。法国哲学家如利科已经注意到无意识对现象学意识的关系。即便我有此打算，那也只是在若干案例分析之后，而且务必消除或澄清用“意识学”为任何形式的“本体论同一”提供先验基设的形而上学幻想。这又回到“导言”所要引入的“现代哲学的维度”中去了。

最难的放到最后。决计先写《创伤记忆》单行本。

二

怎么写呢？

将现有的《创伤记忆》拆散，留下骨架，充实论据，像通常的著作一样？

这样做有两个不便。一、结构上要求完整，自然也要求意识的内部重组以对应无意识的相关性，这是我目前不愿意

做的：有些问题及其表述不能透视，贸然做起来难免重蹈体系化的覆辙。二、案例若作为论据就无法充分展开，既不能深入揭示，又不能重组分类。

还是松散的联盟好，保留《创伤记忆》作为“正文”，“个案分析”，作为“附录”。这样，我可以自由地面对个案，无拘无束地显示个案的个性而不受正文框架的限制。正文与附录不是从属关系，论据必须服从论证的逻辑以符合论点的要求，而是独立互补的，这样就不会在抽象中丢失个案丰富的偶在性。^①

体例确定了，当进入个案的选择与阅读时，一大堆麻烦使我深感自由度的狭小。

原则上，我必须选择两大类。一类“创伤记忆”是重复型的。打一个俗喻，“媳妇熬成婆”；或者，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正是为了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另一类“创伤记忆”是原生性的。例如，深受独断的“真理性”与“权力性”之苦，如何既不用所谓好的、新的“真理性”与“权力性”取而代之，又不陷入虚无主义？这就要求从“真理性”和“权力性”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表现还原到作为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权力性”本身，透视其难免的独断论与虚无化。^②

第一类虽然居多，也还有层次、品性的不同。第二类虽然

① “偶在性”，是从“语言的两不性”中引伸出的概念。它原则上抗拒“本体论”和“虚无主义”的两极化，保留某种例外在任何规范或抽象之外而准备着越界、置换的可能，因而它是“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自然性。

② 中国的“痞子主义”不是“虚无主义”。它像“拉摩的侄子”以玩弄恶而高于恶的“不受骗意识”即看穿了任意否定、毫无原则或以我为原则地玩权弄术。即使“痞子加无聊”也达不到“虚无主义”的“否定即限定”的严肃境界。

居少,同样有层次、品性的不同。两者找起来都不容易。

我只好交给随意性了。好在转型期的人更容易还原到他的偶在性。

其中的选择与更换牵扯太多的背景,它有权留在黑暗里。我只就目前定下的四例个案作一说明。

三

曾卓与巴金是我敬重的两位老人。巴金先生当然更老一代了。前者相识,后者不相识。前者涉及“胡风问题”,后者涉及“文革问题”。原想选择一个“右派”,免了。因为就建国以来的“劫数”而言,“胡风问题”始,“文革问题”终,“反右”并无问题的突破,只是压迫的喘息已窒闷到巅峰状态了。

(要细分,倒是中青年一代理应选一个“红卫兵”或“老三届”,也都免了。我以为他们都是没完的结,以后有得时间弄。)

曾卓与巴金两位先生的创伤记忆,虽然质性不同,曾卓更多倾向“爱”,巴金更多倾向“怨恨”,但两者的抽象性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果:多少还在重复的圈圈内,我们并没有从如斯的“爱”或“怨恨”中找到避免重复创伤的出路。

恕我再申明一次,“重复”云云,这里陈述的只是事实,不带价值,不带好坏优劣的习俗评价。可以批评我分析得“与事实不符”,对错我都认;但批评我分析得“与价值不符”,我只好我行我素了。

四

寻求避免创伤重复的出路,几乎是巴金、曾卓下面一两代人的潜意识愿望。他们的意识可能被各种现实的专业与事务占住,过去好像过去了,但作为问题与取向甚至情绪与气质表现出来的,仍是不同深度地纠缠着的创伤记忆。

第四代青年人常常因此而自傲他们是最没有负担的一代。他们可能太低估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传达各种信息、经验、习俗的汉字——这流动着民族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血液”,以为靠新生活的自然换代而无须经过他人与自我的深刻反省便可毫无因袭地完成自己堪与时符的现代人转型。对此,我只能说,我羡慕你们,上天赋予了你们新生活的特权。但同时别忘了,过去的创伤记忆不属于你们,决不等于说,将来的创伤记忆也永远与你们无缘。要知道,记忆,特别是创伤记忆,它历来就是自我重复的固置形式,只要你没有能力穿透它,它就会在未来的想象中而且是最美好、最富有吸引力的想象中悄悄地复活自身。难道你们没有从你们的“自傲”的口吻或语调中闻到它复活的气息吗?

毕竟,反省的命运更多地还是属于记忆犹新的我们,但我们的两肩能背负起苦难因袭的闸门吗?事实上,巴金、曾卓下面的一代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创伤,其中拥有发言权的几乎代表着当今的学术界或文化艺术界。但浩如烟海的各类文本中,有多少能走出创伤记忆的困扼而进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呢?

没有谁敢在这儿判断、鉴定答案的合格与否。只是问题

必须提出,必须找到可以探讨、交流的方式。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尝试了一种办法:

一、区分作为言述者的“我”与表达式或语式的关系,将其还原为切人的语境(情景)与语言行为整体。

二、不关注文本的总体结构,只关注个别语句的语义分析。事实上流转而更换语境的是个别语句,正像它远离了原初语境,也远离了任何具体的言述者。因而分析这一个别语句丝毫无意累及某人,只要你不作自虐式的受伤理解,它就是一个全然外在的又可自由反思的对象,从而有利于问题的提出、探讨与推进。当然,反思的或后叙事的步骤完全属个人的自愿或自律,均与他人无涉。

三、还有一点纯属我个人的经验,虽然意识到语言的两不性隐含着语言的规定性与反讽,但实际的行文中要想贯彻抵制独断论的防范机制,的确是太难的自律原则。我是个俗人,有俗人的气顺与气逆,写作中常会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有些我注意到立即改了,有些事后注意到也改了,没注意到的没办法,只有请求读者宽恕。但在写作时还有一种情况,我明明当即察觉言带讥讽,也故意不改,不为别的,旨在自怜:比起冒犯大家的监狱时代,克制与转换的功力已非一日之寒了。此处献曝,仅作趣谈化解,识者可一笑了之。

五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除了当代意识形态清理外,无疑要算现代性问题的主流之一。人们倾注复兴的热情研究它是再正当不过的。归根结底,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生长只是时间问

题,各路人马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下面要谈的对个别语式倾向的分析,我说过,目的都在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丝毫无意于是非短长之争。

六

有人说,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说这话的人有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本身的意义域。事实上,这句话传来传去剩下的也只是句子本身的意义,当然这个意义处在同语境的整体性中。主要是什么呢?至少有四。

“感叹”：“这人精通西学居然极端保守”。言下之义,精通西学是不应该保守的,怪异之余,并不打算深究。

“陈述”：“精通西学的人也可以极端保守”。陈述句在模态中认可了一种事实。

“推论”：

- a. “因为精通西学所以极端保守”
- b. “只有精通西学才会极端保守”

从因果到条件,非“当且仅当”的充要条件,仍在模态中,或然地表明精通西学之“精”会深知无法认同,或赞叹西学的独到,或洞察西学的没落,故而转身避民族文化之短而扬民族文化之长,视为己任。

“反证”：“你看,连精通西学的人都得出极端保守的结论,你们这些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半瓢水,还奢谈什么全盘西化!”

前三种只关注“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事实性,确切地说,是个别的事实性或事实的个别性,并不涉及其他。虽然“推论”已使事实的个别性有推及其他的可能,但只是作为可

能存在着,而且仍然依靠着个别事实的指证;刚刚抽象的普遍与其说规范他者,不如说仅规定着个别事实的意义。至于此意义的漂浮与泛化,更多是来自后叙事者的幻想。

后一种“反证”情况就不同了。它不仅明明指向他者,而且目的以真理的方式仅为他者而存在。

换句话说,原来个别事实隐含的意义,现在俨然以普遍的他律原则成为对他者的必然规定或剥夺:有辜鸿铭在,一切用西学维新的人都成了儿戏。

分析到这一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句式在不同的“语境”中或不同的“语言行为”中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而且,不同的意义间,似乎还有一种由“惊讶—认可—推理—他律”的抽象过程,亦即个别事物的“真理”化与“权力”化过程。它看起来是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人的意识要求或意识行为,而究其实,抽象的过程全然在无意识中运作。它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在句式的语境上飘移。我们看到的,是某一个人在他的环境中说,或“惊讶”,或“认可”,或“推理”,或“反证”,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这某一个人,即环境中说着的“我”,与其说是“代词”——指代说者本人,不如说是“索引词”——索引这一情景或语境中都可能这样说的“我”。因而,索引词索引的“我”,实在是一种语境(情景)规定,或进入此语境(情景)的角度,只有在这一语境(情景)中,“我”及其句式才构成语言行为的语义整体。

所以,这个句式的说者和句式的关系,不是“我”和我的所有物的关系,而是句式与语境共同构成的语言行为关系。明白这一点有好处,它是人与人交往包括思想学术交往民主化的条件之一,有了它,我们在交往中讨论或争论问题时,就应

该有一种冷静而明智的态度。对方指出我的论点论证的偏狭,丝毫不应也不会等同成我的偏狭,即使有某种可能的粘连,也决不是二而一的同体。这样,问题才会在事实性领域作深入的推进或拓展,而不会动辄伤及人身。那种动辄伤及人身,即有意识地诘句伤人或被动地作受到伤害理解,固然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化的恶果,但把话语看作是“我”的私有物,因而误解了说者和句式的关系,恐怕也是一个更深层的动因。

另一个层面在句式的词语上固执或固结。前一个层面的无意识,不仅是说者对“我”的词性——代词? 索引词? ——不意识,由此累及说者对我与句式的关系——私有关系? 行为关系? ——不意识,而且是此一语境(情景)中的说者根本无法意识说出的句式的后叙事效应和此句式在其他语境(情景)中的行为语义边界。即便如此,句式作为句式总还在意识的把握中运作。

真的吗,当真对句式意识着? 句式中某个词语会不会暗中成为陷阱使索绪尔的时间链脱落,或使维特根斯坦的句子游戏的行为意义阻塞、中断?

例如,“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中的“精通西学”。“极端保守”当然指的是维护“国粹”。“国粹”是什么? 辜鸿铭时代、吴宓时代,乃至今天的新儒家,说法恐怕都不同。“三寸金莲”、“三妻四妾”,是说不出口了,但“天人合一”的“太极而太和”的“圆融”,据说会是 21 世纪的“明星”。这个词语或话题我留待下面细说。

“精通西学”,出自中国人之口,辜鸿铭时代和辜鸿铭传记者时代,理解不会一样,但日常的语义大体还在“西语说得非常好,西书读得非常多”,以至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中国